

新經濟學典範

馬克思 恩格斯合著

梁武譯

文源出版

馬克思 恩格斯合著
梁武譯

文源出版社發行

新經濟學典範



馬克思
恩格斯
合著
梁武
譯

新經濟學典範

文源出版社

新經濟學典範

作

者

馬恩

克格

斯

譯

者

梁

武

出

版

文

源

出

版

社

發

行

葉

波

澄

發

行

文

源

出

版

社

上海復興中路一三五七B號

電話七八四三二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編者序

本書從恩格斯的大著「反杜林論」中抽出，原是其中第二部份。該書雖以恩格斯的
名字發表，但其中主要意思都是同馬克思商量過的。特別是這第二部份，其中所陳述的
正是馬克思研究的結果。其中最後一節，關於經濟學批判史的敘述，且由馬克思親自執
筆。這一節佔本書四分之一的篇幅，所以我們在書面上標明「馬克思恩格斯合著」是很
公平的。

又編者從原文中刪去了註解及中國讀者所難於知道的典故，特別在這裏聲明。

一九四九七月

目次

頁數

編者序	一
一 研究對象及方法	一——一四
二 暴力論	一五——四五
三 價值論	四七——六〇
四 簡單勞動及複雜勞動	六一——六六
五 資本及剩餘價值（上）	六七——七七
六 資本及剩餘價值（下）	七八——九〇
七 經濟的自然法則 地租	九一——九八
八 「批判史」論述	九九——一二

新經濟學典範（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之部）

一 研究對象及方法

政治經濟學，在其最廣的意義上講來，是一種科學，用來研究那些統治着人類社會中物質生活品的生產和交換之法則。生產及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生產可以不需交換而進行，但是交換正是因為牠是生產品的交換，所以沒有生產，便不能進行。這兩種社會作用，大部分是各處在特別的外方的影響之下，因之大部分牠們也各具有自己特殊的法則。但這兩種作用，同時這樣密切地相互造成條件，相互發生影響，使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規定經濟曲線的橫線和縱線。

人在生產物品及交換物品時所處的條件，在各國各不相同，這種條件，在同一國家裏也隨時代而變更。政治經濟學，對於各個國家對於各個歷史時代，不能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箭，石斧，和希有的交換關係等，到近代的幾千匹馬力的蒸汽機，機械紡織機，機器，英蘭銀行等，不知道隔開多少距離。火地島的居民，還沒有達到大批的生產和世界市場上的貿易，還沒有達到支票的來往和交易所的恐慌。所以，誰要想用同一的法則去統一火地島和近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那麼他

顯然的除了說些最尋常的共同點以外，再不能發表什麼新的意見。所以政治經濟學，就其自身的本質講來，是一種歷史的科學。他要研究歷史的，即不絕變遷的材料；他首先考察生產和交換發展上每個階段的特殊法則，祇在經過這種考察後，牠才能够定出很少的最普通的可以用於一般生產和交換的那種法則。這上面，自然顯明地可以看到，適用於某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法則，同時也適用於那些具有同樣生產方式及交換形式的歷史時期。譬如，自金屬貨幣應用以來，就產生了許多法則，這些法則，同時可以適用於一切利用金屬貨幣來進行交換的歷史時期。

物品分配的種類和方式，依靠於某個歷史時期生產和交換的種類與方式，依靠於社會的全部歷史的條件。全體開化的民族，大都在歷史上經過氏族社會或鄉村公社（或是經過牠們的主要的殘餘），在氏族社會或鄉村公社裏，土地是公有的，所以產品的分配，也自然而然的極其平均；如果在公社社員分配物品時，已經發生了較大的不均，那就是公社開始崩毀的表記。大的農業和小的農業，根據於他們所從而發展的歷史條件的不同，形成非常不同的分配方式。但是顯明的，大的農業所形成的分配方式，總是和小的農業所形成的的大不相同；大的農業，要有階級的對抗，或是造成這種對抗——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工役制的農民，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等，可是在小的農業中，投身於農業的單獨個人中間的階級區分，絕對不是必要的，反之這種區分存在的事實，已指明小農經濟是在開始崩毀了。如果以前全屬自然經濟或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國家，應用了並且傳播了金屬的貨

幣，那麼牠同時總是使以前的分配也經過慢的或快的改革，就是說，單獨個人中間的不平均增加起來，所以富人與窮人的對抗也增加起來。中世紀各地狹窄的手工業生產，使大資本家及終身受人僱傭的工人無存在的可能；可是近代大工業的興起，近代信用制度的發展，以及與這兩項相適應的交換形式——自由競爭——的發展，不可避免的造成這些階級（資本家與工人）。

因分配的不均，階級的區別也產生了。社會分成特權的和無權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階級。各個同部落的自然組成的團體，開始祇是爲着保障共同的利益（譬如在東方，是爲管理灌溉事業），爲着防禦外來敵人，而形成一種國家，這種國家到了現在，已經獲得別種任命，就是以武力保障統治階級生存及統治的條件，去反對被統治的階級。

但是，分配不祇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結果；分配反過來又影響於生產及交換。每個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交換形式，開始不但受舊的生產方式交換形式以及與之相適合的政治組織底障礙，而且還受舊的分配形式底障礙。牠們（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不得不以長期的鬥爭去爭取與牠們本身相適合的分配形式。但是某種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愈是活動，愈是發展，牠們所產生的分配也更快地達到這種地步，使牠（分配）和生產方式及交換形式相分離，並與之發生衝突。前面所說的舊的自然產生的農村公社可以存在幾千年，直到牠們的對外關係在牠們中間產生財產上的分別使牠們因之開始崩毀的時候爲止；這種公社，我們現時在印度及斯拉夫人中間還可以看到。但是資本主義的

生產，雖然還祇存在三百年，雖然祇在大工業發生以來即一百年以來才得到真正的統治地位，但是牠在這個短時期內，已經在分配中形成了對抗形式——一方面資本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他方面無產的勞苦羣衆集中於大城市中——因着這種對抗，資本主義生產，不可避免的要趨於滅亡。

每個社會的分配形式與物質生活條件的連繫，這樣深刻地侵潤於事物的本質，使牠必然的要反映到人民的心理上。當某種生產方式還是往上發展的時候，那末就是在該分配方式（這分配形式是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中受到損失的人們也會稱頌這個生產方式。在大工業開始發展的時候，英國的工人，就是如此。并且，當這個生產方式，還在社會中平穩地進行，社會還大多是滿意於牠的分配的時候，即使有反抗之聲發生，也祇能發生於那些統治階級出身的人們（聖西蒙，傅立葉，歐文）之間，而且他們的呼聲也得不到被剝削羣衆的任何響應。祇在是種產生方式已經走過較長的衰落的階段，當牠一半已經陳腐，當產生這種生產方式的條件已經大部分消滅，當牠的繼承者已在敲門的時候——祇在這個時候，不絕發展的分配的不均纔被人們看作是不公平的現象，人們纔根據過程上的事實，去尋求所謂永久的正義。這種求助於道德和法律的意見，在科學上，對於我們並有什麼幫助；無論根據於道德的憤激，是怎樣的入情入理，可是經濟科學，祇能把牠看作一種象徵，而不能把牠當作一種證明。經濟科學的任務是在於證明：現在所發現的社會制度的缺陷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的結果，同時又是這個生產方式將要崩裂的表記；再者，經濟科學就在往下崩毀的經濟

形式裏面，找出能够剷除這種缺陷的，將來新的生產與交換組織之成份。痛苦造成詩人，在指示社會缺陷及攻擊統治階級走狗（那些人專找現存制度的優點，以遮掩牠的缺點）的時候，儘可利用這些痛苦；但是在一切歷史的時代中，都有充分的痛苦的材料，所以牠很少能够作為現社會缺陷的證明。

政治經濟學，按廣義來講，是這樣一種科學，牠研究各人類社會裏生產，交換，及產品分配（分配，是與生產及交換相適應的）等等的條件與形式——這種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還是要由我們去創造的。現在我們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差不多祇是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起源和發展：牠開始批判封建時代生產及交換形式底殘餘，證明這些殘餘一定要為資本主義形式所代替；再後，牠從正面闡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交換形式的法則（交換形式是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所謂正面，就是說這些形式，還能適合整個社會的目的；最後，牠以社會主義觀點，批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是從反面說明牠的法則，證明這種生產方式，因自身發展的結果，將迅速地達到這樣的境地，使自身不能繼續存在下去。這個批評證明資本主義生產及交換的形式已經成為不能忍受的生產本身的桎梏，證明那些形式所必然形成的分配方式已經造成日益不能忍受的階級的區分，造成日益尖銳化的階級的矛盾，一方面有日益富厚的資本家，他方面有無數的情況日益惡化的一無所有的僱用勞動者；最後，更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不能應付牠本身所造成的巨大的生產力，這些生產

力，正在等候着自己轉入有組織有計劃共同進行工作的那種社會，使全體社會的份子都能有一定的生活資料，使全體社會份子都能更自由發展他們的能力。

倘要各方周到地批判資本主義的經濟，那麼祇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及分配，還是不夠的。至少還應該扼要地考察資本主義以前的形式，或同時存在於落後國家的形式，把牠們用來和資本主義形式相比較。直到現在，祇有馬克思一人，一般地採用這種考察和比較；我們對於資本主義以前的理論經濟學的智識，差不多完全是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得來的。

狹義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因各個天才的學者的努力，已在十七世紀末發生，但是像重農學派和亞丹斯密所敘述的那種有條理的學理，却實際是十八世紀的產兒，牠和同時的法國啓蒙學派的學說是密切地相連的（法國學者帶着這個時代的優點，也帶着這個時代的缺點）。我們關於法國學者所說的話，也可以應用於那時的經濟學家。新的經濟學，在他們看來，不是他們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恆的理性的表現；經濟學所發現的生產與交換的法則，在他們看來，也不是歷史上某種經濟活動形式的法則，而是永久的自然的法則，他們以爲這種法則是從人的天性中產生出來的。在仔細觀察時，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所說的人，不過是那時正在轉變爲資產者的那種中等市民，他的「天性」，祇是在於生產工業品並且根據那時的一定的歷史關係而經營貿易。

在我們充分地認識了我們的「批判的創始者」——杜林先生及其哲學方法以後，我們可以很容

易預言他對政治經濟學將採取何種意見。在哲學一方面，當他不是胡說八道的時候（譬如對於自然哲學），他的觀點也祇是十八世紀思潮的諷刺畫。他不研究歷史性的發展的法則，而是研究自然的法則，永恆的真理。他不是用某種歷史的條件，而總是用奇特的兩箇個人的關係去決定社會的關係，在這兩箇個人中，一個人或是壓迫別個，或不壓迫別個——後一種情形，可惜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過。我們預先可以說，杜林先生結果將把政治經濟學歸為終極的最後真理，歸為永恆的自然真理，歸為無謂重複的公理，但是同時他所知道的正面的內容，却從後門偷偷摸摸地溜進來；他不從生產和交換中得出分配的社會現象，而把這種分配轉交他的有名的兩箇個人去作最後的解決；我們預先說這樣的話，是不會十分錯的。上述這些既是我們所已經熟知的方法，那麼我們祇加以簡短的分析就儘够了。

真的，在第二頁上，杜林已經向我們說，他的經濟學，根據於他在哲學上所已「確定」的原理，並且「在主要的幾點上，根據於更高度的真理，這些真理，已在最高的研究的階級上，得到最後的證明了」。到處都是同樣的令人厭倦的自誇，到處都是杜林先生的成功，自詡一切都已由他「確定」，都已由他作了最後的證明。

接着不遠，我們就看到「一切經濟的最普通的自然法則」——這正指明我們在上面所猜的話並沒有錯。但是這些法則，祇在這種情形之下，方能使人們正確地了解過去的歷史，就是「人們一定

要從牠們（法則）的結果所採取的最切近的一種形式上，去研究這些法則（法則的結果之所以採取這種形式是因為壓迫和階級的政治形式的關係）。這樣的組織，如奴隸制度，僱傭勞動制及暴力奪得的財產等等，都應該看作是純粹政治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形式；牠們造成一個範圍，使經濟自然法則的作用，在這種範圍中方能表現出來」。

上述這種主張，盡了吹喇叭的作用，牠應當報告我們，那兩個有名的個人就要出現了。但是這種主張還帶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牠是杜林全書的主旨。在說到法律的時候，杜林除了以社會主義辭句很壞地翻譯盧騷的平等理論以外，再不能給我們說出其他意見——其實這種翻譯的更好的標本，好幾年來，已在巴黎任何工人的咖啡館中，可以聽到。現在他也是同樣很壞地翻譯經濟學家的怨辭，這些經濟學家，埋怨國家的武力的干涉變動了永久的自然的經濟法則及其效用。因此，他杜林先生在社會主義者中間，自然得不到共鳴者。每個工人的社會主義者，不拘何種國籍，都很明白地知道，武力祇能保護剝削，而不能造成剝削；知道工人所受剝削的基礎是資本與僱傭勞動的關係，更知道這種關係是從經濟上發生，而不是由武力產生的。

再後，我們更可以從他書上看到，一切經濟問題『可以分兩種過程——生產的過程及分配的過程』；以膚淺著名的經濟學者塞依（J. C. Say 1767—1832），除兩種過程之外，還加上第三種過程——消費的過程，但是他自己以及他的門徒，都不能在這上面，說出確當的理由。據杜林意見，

交換或商品流通祇是生產下面的分類，他把商品從生產到最後真正消費者中間所完成的一切過程都歸入生產下面。我們知道生產與流通雖然相互形成條件，但是牠們的本質却是不相同的，杜林把這兩種過程混在一塊，並且非常輕易地說，除去這種混亂狀況，「祇能產生更混亂狀況」，這種意見，祇能證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最近五十年來商品交換的巨大的發展。他的書上以後的內容證實了這點。還不止此。他既在總的生產名義之下，把生產和交換併在一起，又把分配和生產相對立，把牠當作第二的完全無關係的和生產毫不相同的過程。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交換在其要點上看來，總是某個社會的生產及交換方式以及這個社會的歷史條件等等底必然結果；知道了上述這些原素，我們就可以很正確地估定這個社會裏主要分配方式的性質。但是同時我們看到，如果杜林先生不願改變他在道德法律及歷史等等學說上所「確定」的原則，那麼他就不能不否認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特別是爲了要把兩個不變的個人偷運到他的政治經濟學裏面去，所以他更不能不否認這個事實。

我們開始且來回溯我們討論道德及法律問題時的情形。那時，杜林先生開始祇從一個人說起：他說道：「如果我們把某一個人看作單獨的，或是設想他不和別人發生任何關係，那麼這一個人，是不會負什麼責任的。他沒有應該做的事，而祇有願意做的事」。但是這樣毫無責任孤獨存在的人，除了天堂上命運注定的「原始猶太人亞當」（這位亞當在天堂上沒有絲毫罪惡，簡單的祇是

因爲他不能犯罪）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人呢？但是這位現實哲學所造成的亞當也要犯罪。因爲在亞當之旁，發現了另一個人，即使不是滿面搽粉的夏娃，也至少是第二個亞當。亞當立刻得到了責任——而且破壞了這個責任。他不和他的兄弟親密地擁抱起來，不把他當作平等的人，而把他壓在自己統治權之下，把他奴役起來——因他犯了第一次奴役罪，所以全世界直到現在，總是受苦，因此，據杜林先生意見，全世界歷史，是一錢不值的。

我們順帶的指出：如果杜林先生以爲他把「否定之否定」稱爲古代犯罪及贖罪歷史的複寫，就能使人對於「否定之否定」發生充分的輕視，那末我們對於他自己翻印同樣歷史的新版書，將有什麼話可說呢？（因爲我們對於贖罪，像我們貴客所說的，還須時常「更切近地去觀察」）。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接受閃族的傳統，說男女一起犯罪，還有一些意思；讓杜林先生毫無競爭地得到兩個男子成立犯罪行爲的發明者的光榮。

我們且來聽他怎樣把法律譯成經濟的習語：「無論如何，關於魯濱孫的想像，可以作爲生產觀念的適當的邏輯公式，這位魯濱孫，用他全部力量孤獨地和自然界相對抗，他儘可不和別人平分什麼……同樣合式地，我們可以用兩個人的邏輯公式，來顯著地說明分配觀念中的要點，這兩個人的經濟力量合併起來，他們顯然的在某種形式內一定要對於相互的分配發生爭執。真的，除了這個簡單的二元論以外，再不需要什麼。用了這個二元論，就可以非常嚴格地敘述分配關係上最主要的

幾點，并且從基本上研究分配關係的規律，把牠看作邏輯的必需……兩人或是在平等的條件上共同工作，或是一個人完全服從別個。在第二種情形之下，前一個人就降到奴隸或簡單經濟工具的地位，因之他已受奴隸的看待……在平等情形和卑賤情形之間，在萬能和單獨的積極參加之間，存在着許多居中的階段，全世界歷史，就是寬廣地想填滿這些階段。這上面主要的先決條件，是對於歷史上公平與不公平的各種制度，要有一種包羅萬有的觀點」……在結束時，全部分配就變成了「分配的經濟法則」。

現在杜林先生終竟得到堅固的地盤了。他和他的兩箇個人一起，可以誇耀於當世了。但在在這第三個人之後，還站着一位無名先生。

「資本並沒有產生剩餘勞動。無論在什麼地方，要是社會裏面一部分人壟斷生產手段，那麼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勞動者，不得不在維持自己所必需的工作時間以外，加上剩餘的時間，去爲生產手段的所有主生產他所需要的生活資料，這個所有主，或是雅典的貴族，或是愛脫魯司的僱侶，或是羅馬的自由民，或是諾曼的貴族，或是美國的奴隸主，或是瓦涼的領主，或是近代的地主與資本家」（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三二七頁）。

在杜林先生知道了什麼是以前一切生產形式（在階級對抗中進行的生產形式）所共通的基本剝削形式以後，他現在祇要利用兩箇個人就好了，現實經濟學的深厚基礎，於是完成了。他們（這

兩個人）毫不遲疑地出來執行這個「創造制度的思想」。可是這上面的主要事實，祇是在於：工人工作，超出他維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工作時間以外，工人的剩餘工作，沒有得到相等的報酬。所以，在此地稱為魯濱孫的亞當就強迫第二個亞當（或稱禮拜五）用盡全力來工作。但是為什麼禮拜五要工作到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時間以外？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部分地從馬克思著作上得到回答。但是依我們的兩個個人看來，這些都是大過冗長的歷史。他們以敏捷手段幹成這事：魯濱孫「壓倒」禮拜五，強迫他「像奴隸及勞働工具一樣地執行經濟的工作」，并且待遇他也「祇是像工具一樣」。杜林先生用這最新的創造的辦法，好像用氣鎗一樣，一次打死兩隻蒼蠅。第一，他因此可以不必費力地去解釋以前所有許多分配形式，其中區別，及其因原等等：這些形式，都是一錢不值的，牠們是都依靠於壓迫及武力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很快地就要加以解釋，第二，他把整個分配的理論，從經濟的基礎，搬到道德和法律的基礎上，就是說從已經堅固地確定的物質事實底領域，搬到多少是動搖的意見和感情的領域。這樣，他就不再需要考察和證明，他祇要輕易地宣佈就够了，他可以提出要求，使生產品的分配，不是按照牠的實際原因進行，而按照杜林先生所以為是道德的及公平的那種條件來進行。但是杜林先生所以為是公平的那種條件，絕對不是不變的，因之牠也絕對不會是真正的真理，因為據杜林自己的意見，這種真理「一般的講，是不變的」。真的，在一八六八年，他曾寫道：（「我的社會思想的命運等」）「任何更高的文明，總有一種傾